

任丘文史资料

顾 问：李秉哲

主 编：李 琚

副主编：于桂兰 丁 元

编 辑：宋洪坦 任洪俭 安春雪

毛福安 王俊卿 康洪生

张僧会 王洪章 史朝珍

王传玉

前 言

章琰，原名姜维青，号梦云。系本市北辛庄乡姜临河村人。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在上海，曾参加了肇和兵舰起义和刺杀护军使郑汝成事件，后在上海总督陈其美的指挥下，赴北京、天津一带组织倒袁机关，开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是本市参加民主革命较早的人士之一。1924年初，章琰入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后授少校军衔，1925年2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并发动的第一次东征叛军陈炯明的战役，任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一营党代表，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身先士卒，牺牲于东江棉湖。其英名已被载入史册。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将章琰及东征阵亡的将士遗体合葬于广州长洲岛平冈的“东征阵亡烈士墓”。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章琰烈士的革命事迹，在家乡很少有人知道，就连其家属也不清楚。自1989年以来，市政协文史办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本着“挖掘、抢救”的精神，曾多次派得力人员到其原籍、天津、塘沽、广州等地进行了认真考察，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政协及有关部门和知情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广州市政协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及章琰烈士的次子姜恒祥、孙姜俊彬、姜嘉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这不仅为章琰烈士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也为任丘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内容。

现在，我们将章琰烈士的有关史料作为《任丘文史资料》专辑出版，其目的：一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

负责，让历史事实还其本来面目；二是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三是，愿将本市范围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有志之士载入史册，以他们的革命精神，启迪教育后人。

但是，由于章琰烈士参加革命活动较早，且已牺牲了半个多世纪，加之我们在这段工作中得到的历史资料有限，所以在编印过程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恳请广大读者、特别是知情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4月

目 录

国民革命的著名烈士章琰.....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证明信.....	24
姜维青履历表.....	25
军校烈士名录.....	26
第一次东征指挥系统续列表.....	30
资料：《 棉湖之役 》.....	32
赵熙明给姜廷辅的信.....	48
资料：《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	65
姜维青手书.....	67
资料：《 章琰遗稿 》.....	72

国民革命的著名烈士章琰

章琰，本名姜维清（后改维青），又名姜崧，姜痛尘，号梦云。化名章冀西，章昱、章琰。任丘市北辛庄乡姜临河村人。学生时代投笔从戎，毅然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致力于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斗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两党合办黄埔军校，章琰入该校任教官，亲自编写讲义，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为培养三民主义军事政治干部花费了大量心血。1925年，在平定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任营少校党代表，牺牲于棉湖战役，时年三十五岁。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姜维青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任丘县姜临河村一户农民家庭。传说姜氏先人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赵王河畔，后逐渐形成村庄，虽姜姓户数较少，但因来之最早，故定名为姜家临河村，后简称为姜临河。这里傍河邻淀（白洋淀）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村民辛苦一年，难得温饱。姜维青的祖辈都是庄稼人，靠勤耕苦作，节衣缩食，成了小康之家。其父姜廷辅，兄弟四人，行三，分家时，分了几十亩田地，正常年景生活还能过得去，遇到天灾人祸，也免不了为衣食发愁。因此，直到姜维青离家求学时，还常常挂念家中“足食与否？”

据迷信传说，1890年的一天，姜家院内降一火球后，紧接着姜维青降生，全家皆大欢喜，但仔细一看，其右手多一畸指（六个指头），父母虽疑为不祥，但因只这么一个宝贝

儿子，仍视为掌上明珠。

孩童时代的姜维青，活泼爱动，好胜心、好奇心强。下河捉鱼，扒房掏鸟，上树逮蝉，事事不甘人后，同龄小伙伴对他既羡慕又嫉妒，背后偷偷叫他“小六指儿”，当面又不得不服他管。维青平时特别爱听老人们谈古论今，讲说当地流传的一些侠义人物和民间故事。姜临河村位于任丘城北，离当时北方著名的商埠郑州只有七、八里路。在他小的时候，昔日繁华的郑州虽已衰落萧条，但有关郑州的传说却用车装不尽，用船载不完。什么“郑州鏢头李存义”的故事，“赛天坝姜玉和”的故事，“郑州庙拿谢虎”的故事以及“神医扁鹊的传说”、“火烧郑州庙的传说”、“五龙潭的传说”等等，这些故事和传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过数不尽的神往和遐想。

尤其为人们称道的是姜维青的博学强记。他在本村上私塾时，“先生”常被他“难住”，后来那位私塾先生只好自行引退，让“另请高明”。据他的同学说，先生讲课时，维青根本不认真听，他只看一遍书本，就能记住。维青小时候的伙伴田林祥，多年后还时常对自己的子孙们说：“咱村的姜六指（姜维青）真是过目成诵，没人能比。”后来姜维青的父亲教孙儿姜恒祥珠算时，常教训说：“你学一冬天珠算也不如你爹小时候学一晚上会得多。”

姜维青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动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肆意瓜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反抗。继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3月，山东爆发了“义和团”、“红灯照”起义。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到处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发展

很快。短短一两个月间就席卷了京、津，遍布华北，波及长城内外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及各阶层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任丘。全县共设坛、拳场60多个，入团民众近三千人。同年5月，县境内的义和团曾攻打段家务、东八方、西八方等教堂，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仅使清朝统治者闻风丧胆，也使帝国主义列强深感不安。因此，1900年5月，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他们与清政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后又强行与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少年的姜维青对这些大事虽不甚了解，但兵荒马乱，民遭涂炭的景况在思想深处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后，任丘农村陆续废私塾，办学堂。1905年邻近的三塚村办起了公立小学堂，随之姜维青入该校读书。一年后（1906年）便考入任丘县立高等小学堂。此年，姜维青正好十七岁（虚岁）因家中人手少，父母便给其结了婚，妻子是北辛庄村刘姓姑娘，后生二子，长子福祥，次子恒祥，母子三人跟随老人一直在老家种地为生。至1978年12月，其妻病故，时年90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姜维青在任丘高等小学没毕业，考入河间府立中学堂。这所学校是1901年在瀛州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改元民国后定名为河北省立第三中学，学制四年。期间，因其学习成绩优异，一直名列榜首。当时新式学堂实行给成绩优秀学生送喜报的办法，所以姜维青家中的喜报贴满了墙。由于姜维青聪敏过人，所以邻村一些有钱人家争着请他利用假期为自己的子弟补习辅导，并以代姜维青交

纳学费为报酬，这也进一步坚定了姜维青的父母让其上学深造的决心。

1909年（清宣统元年）春，姜维青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高等工业学堂。这所学校是1903年由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初建时名为“北洋工艺学堂”，后改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该校分初等班和高等班。初等班设化学、机器制造等基础课程；高等班为专科，设化学专科、机器专科、绘图科等。

学生时期的姜维青，对于人生之路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在他的脑海中，“求学”压倒“谋生”，“治家”重于“忧国”。这从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二十三日给父亲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儿将来中学备（毕）业（按：指初等班毕业）后，决意不入本堂之高等班。”“俟宣统五年春，必转入他处官费之学堂，以免累及家中。”又说：“近闻家中被水所淹，不知实否？家中秋收若何，足食与否？……望来一详信示知。”“冬日可勿令田秋长下工，以免亲受辛苦。”又说：“八月十九日湖北武昌府、汉阳府、汉口皆被革命党占据。大江两岸各省，人心惶恐异常，湖北官兵亦多随从革命党者。大乱已起，不知将来如何。家中地亩得卖便卖，粮米不可不多存。不然粮米一贵则坏事矣，至要至要。”……

二

1911年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爆发的武昌起义，象一声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唤醒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接受了一定新思想的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清末新军中的一些官兵，情绪更为振奋。姜维青也不例外，在辛亥革命洪流影响下，他毅然终止了刚刚学习两年多的学业离津南下投

笔从戎，在上海参加了沈建侯组织的学生军（沈建侯，字定一浙江人，当时在政界很有名望），投身于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斗争之中。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学生军改名为入伍生，归陆军部所辖，由黄兴（字克强）直接指挥。同年四月，南北议和后，南京政府迁往北京。随之决定把入伍生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不料国内其他地方的陆军小学生反对（因入伍生相当于陆军小学水平，直接送保定军官学校，升格太高）。正在此时，发生了所谓“西藏独立”事件。1912年5月10日，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企图支持西藏某些地方势力策划脱离中华民国政府。6月3日，英军进攻箭炉，军情日益紧急。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派人请援，6月7日，四川政务处决定请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6月11日尹昌衡就任西征军总司令。14日，袁世凯“申令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在这期间，姜维青便与结盟好友赵熙明等联名向报界宣言，请求陆军部将入伍生改归征西军。陆军部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却听从了全国陆军小学生的意见，约在七、八月间，将入伍生送返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补习。到校后，姜维青与赵熙明仍被编在第四连。这期间，姜维青感到“维清”二字不妥，因为清王朝已经覆灭，何“维”之有？遂将“清”字改为“青”字。在校学习一年有余，相安无事。

1913年（民国二年）下半年，一次，教几何的教员给学生上课，姜维青与这位教员发生了口角。由于他胸怀积郁，加之性格暴躁，竟在课堂上大骂几何教员“人格破产”，是“兔子之流”。教员向校长金永炎报告了此事，金逐下令将姜维青开除学籍。姜在武昌不能呆了，手头又没有多余的钱

物，最后，赵熙明等几个要好同学典当衣物凑了些川资让姜维青离开武昌来到北京。

姜在京“坐困日久，一筹莫展”。境况凄凉。现存的姜维青遗物中，有一帧于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在天津照的全身照片，背面书写着“姜痛尘年二十四岁肖像，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拍于津埠”。此时姜维青为什么改名“痛尘”？顾名思义，“痛者”，痛恨（或痛心，痛惜）也，“尘者”尘世也。——一腔报国热忱成泡影，炎凉的世态竟使有志青年难存身，怎能不痛心疾首而生悲愤之情呢！

为了寻求出路，经同窗好友赵熙明介绍，想到新疆投奔赵的同乡杨晓楼（时在新疆任骑兵团长）。在当时，去新疆需取道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所需费用很多，个人又无法筹集，因此，姜回家乡一次，谎说去黑龙江垦荒，让家中凑集了银元二千元。

1914年姜维青去新疆，此行他充满信心，也有一番抱负，化名章莫西。决心要在西方做出一番事业，奠定人生基础。不料，到新疆后被怀疑为“乱党”不予接纳，无奈姜维青又回到北京。这时，他听说陈其美到了上海，因与之有旧，便由京抵沪，追随陈其美从事反对袁氏复辟帝制，维护共和的斗争，此期间，姜维青为了掩护身份，先后化名章县，章琰。

陈其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上海策划了两件大事，一是刺杀上海护军使郑汝成，二是策动肇和兵舰起义。这两件事章琰都是参与者之一。1913年孙中山讨袁失败后，大批讨袁的中下级军官流落到上海，一为谋生，二图再为革命效力。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后，派范光启（字鸿仙）回到上海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秋，范光启被刺身

死，上海革命活动群龙无首。乘此机会，上海护军使郑汝成和警察厅长徐国良残酷屠杀革命党人数以万计，大部是原讨袁军的中下级军官。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又派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长陈其美回上海继续领导革命活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陈是热衷于搞暗杀的，所以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便是安排除掉郑汝成。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最后选定1915年11月10日，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举行祝贺日皇加冕招待会这天动手。事先，他从上海各革命组织中选出约百名忠实、勇敢、精于射击的人（章琰亦在其中），划分42个狙击点，待郑汝成经过时将其击毙。这天，郑汝成乘车从礼查饭店道贺后返回时，在白渡桥（第二个狙击点）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王晓峰、王铭三打死。12月5日，陈其美又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进攻电话局及警察局，章琰也参加了起义活动。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这些活动，目的是反对帝制。而袁氏复辟帝制的丑剧不仅没有收场，反而更加紧锣密鼓。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了接受帝位的申令，13日，接受百官朝贺。并册封128人的封建爵位，12月15日袁下令处理肇和兵舰起义事件，撤掉舰长黄鸣球。12月31日，袁又下令民国5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元旦这天登基……。于是，陈其美派章琰携万元经费到北京组织倒袁机关，负责京、津一带倒袁活动。章琰到北京后住东四皮裤胡同45号。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举国上下讨袁之声奋起。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了《讨袁檄文》，号召人民“誓殄元凶，再奠新邦”。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1916年元旦，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2月22日，孙中山任命

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以调度讨袁军队。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表示不能承认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甚至连袁世凯的部下将领也对帝制表示消极。所有这些，使袁世凯进退失据，不得不于1916年2月23日下令“缓办帝制”，3月23日又宣布“取消帝制”。5月18日袁世凯派人将陈其美刺杀于上海日侨山田的寓所。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唾骂声中忧愤而死。

帝制取消，袁世凯、陈其美已死，章琰在京津的使命亦告结束。

此后，章琰在个人生活方面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上海他认识了一个叫傅文郁的女革命者。此人原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其父在清末曾任道台。傅留学日本时参加革命活动，因此，其父被参革职、抄家。傅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章琰到上海后，经人介绍，二人相识并相爱。章在北京组织倒袁活动结束后，便同傅结了婚。不料，傅文郁挥霍无度，不懂持家，婚后不到半年，便把章琰剩余的倒袁经费全部花光。民国五年（1916年），章琰又回老家筹款，谎称在外犯案，为人所算，为出外避祸，欲变卖家产，家中老人又给其凑了些钱，一回京很快又被傅挥霍一空，不久二人关系破裂，傅经常以“求借金钱”为由，日夜不归。章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宣布与傅离婚。不足十日，傅即在京与某议员结婚。这次婚变之后，章琰感到既无颜对家人，也无颜见朋友，于是决心远游他方。并取号“梦云”。

在这期间，国家政局日益混乱。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侵略中国的共同走狗，便各自物色、培植新的代理人。而另一方面，其部下的北洋将领也因失去了共同的头子而形成各种派系，为了争地盘，扩大势力范围，他们各自

寻找帝国主义做靠山。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此时，章琰看到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遭到瓦解，国家分崩离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进一步促成了他摆脱世俗，息影蜚居的志向。

此后直至1924年，他的行踪作为很少人知晓，据其孙姜嘉彬回忆：听父亲讲，在这七、八年时间里，祖父曾给家中来过两封家书，但均未写清地址，也没说他干什么事情。

1924年，（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积极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后决定利用黄埔岛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面派数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到军校担任教育工作，一面无条件地拨给军校二百万元作为开办费。中国共产党也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到军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因军校设在黄埔岛，后来一般通称黄埔军校。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由程潜担任，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因此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张静江曾跑到广州找孙中山替蒋说情，孙中山才决定改派蒋介石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校的，实行党代表制。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的命令无效。军校党代表是廖仲恺。除校长、党代表外，下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政治部主任初为戴季陶，后来戴离开广州，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后因此人不接近干部、学生，遭到反对，经廖仲恺、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会商后，决定请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担任政治部主任。于是中共中央

决定派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校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军事教官大部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及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学校。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入校，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底毕业。章琰因入过武昌军校，加之在上海与蒋介石相识，也被聘为黄埔军校上尉教官。从此他结束了奔波流浪的生活，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

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为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重。各类课程虽有总的授课时间和要求，但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教员按照各门课程的授课次数编写讲授提纲，在规定时间内讲完。上课时学生既无书本，也没有讲义，只凭自己当堂作笔记。章琰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期间，由于教学需要，集中精力对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军的建军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并于1924年八月至九月写出了《三民主义革命军的新精神》、《中国征兵制雏议》、《军需独立制概论》等三篇文稿。这些文稿曾登载于该校校刊《革命军》上。

为了对章琰的思想有所了解，现将其《三民主义革命军的新精神》一文的主要论点归纳摘引于下。这篇文稿完稿于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八月廿八日。也就是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前三个月。重点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三民主义革命军的新精神。文稿提出：“我们革命军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不为私人当打手，不为私人当奴隶的精神。我们是确能为国家而牺牲的军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建立国家的三民主义，作为努力奋

斗的目标。自大元帅以至士卒，都是为我们这个建立国家的三民主义而牺牲的”。我们中国的富藏，素来是号称甲于天下的，为什么弄出“民穷财尽”的现象呢？这里有两种恶势力存在，叫我们不能不民穷财尽……。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主义，一个是国内军阀官僚政客们的私人发财主义。这两种恶势力要使中国发生一个贫血症，任你生出多少血来，他们都可以吸收了去，置之死地而后已。若不设法把这两种恶势力驱除了，中国人不但要国破家亡，经济压迫的结果，人伦道德都要破坏无遗……，种族也就随之而灭了。

“这两种恶势力现在已经联合起来，对我们中国实行总攻击了，内外夹攻，里应外合，军阀、官僚、政客勾结资本主义各强国，狼狈为奸，来弄中国的财源，中国的人民焉得不穷困？中国的国家焉得不危险？我们既是中国人，就决不能看着自己危险沉沦，自然要想一个自救的法子才对，有什么好方法比三民主义更为适合调治中国这个贫血症吗？如果没有别的好方法，那就非实行三民主义去努力革命不可了”。文稿还具体阐述三民主义的含义说：“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义，所凭借的是对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若想解除经济侵略的压迫，非取消那些束缚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可。想解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非行民族主义的革命手段不可。民族主义的革命手段，就是三民主义的头一个主义，用这个主义来和世界诸民族争平等争自由。”……

“国内军阀官僚们的发财主义，他们的直接凭借固然是依仗他们部下那些不知国家为何物的奴隶军人，替他们去占据地盘，以便其搜刮民财，但是，他们有一个间接的手段……，就是勾结猪仔议员，冒称国会，造一部强奸民意，

铜臭薰天的宪法出来，为他们舞弊营私的保障，把持政权，压抑民权，然后他们可以搜刮自由、卖国自由，尚说是合法以欺国人。若想驱除这种祸国害民的恶势力，是非实行民权主义不可的……。现在我们虽然名为民主国，其实我们国民并没有半点权力，只有官权，而无民权。你看曹锟贿选、议员卖票，这是何等重大的叛逆行为，而国民竟没法制裁，军阀官僚搜刮钱财，无微不至，而国民只好忍痛承受，这就是国民不能行使直接民权之所致。因此，我们革命军主张施行民权主义，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从军阀、官僚、议员手里夺回来还之国民。等我们把政权夺回之后，施行直接民权、创制、罢官、复决、选举等权，都由人民直接行使。到那时候才算成立真正的民主国，这是三民主义的第二个主义，用以驱除祸国害民，把持政权的军阀官僚们，以复我民权者也。……”

……“以上两个主义仅是建立良好国家的第一步，只能成立一个国家的‘形’与‘势’，尚不是成立国家的目的。若想收国家的最后实利，必然再行第二步功夫。”我们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国家者，目的是在求我们中国民族的生存与人民的幸福。因此我们必须实行一个民生主义。……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在逐走强盗之后发展自己产业的意思。……

……“以上三个主义是两个手段，一个目的。是联贯而行的一个主义，不是可以分开独行的三个主义。必须把内外夹攻的强盗们逐走，方可实行民生主义……。”否则，“即使能够发达，那也是替强盗造产业罢了。民生主义如果不在民族民权两个主义之下，是千万行不得的，并且事实上也是绝难独行的。”所以，“我们现在若想得安乐的幸福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是应该暂时放下锄头和斧头，不顾一切地努力于民族，

民权主义的革命行为，把我们的一切障碍铲除了，把安乐幸福丰衣足食的基础打坚定了，然后再拿起锄头和斧头来实行我们的民生主义，这是顶要紧的话。”

文稿强调指出：“我们的国民党，不是为私人争权夺利而结党，是以三民主义为中国全民族争权夺利而结党；我们的大元帅，不是为大元帅而当大元帅，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当大元帅；我们的革命军人，不是为图一个军人的生活职业而当革命军人，是为铲除三民主义的障碍而当革命军人。……三民主义革命军的精神，就是以民族平等的生存及人民均等的幸福生活作为我们努力奋斗的最后目的，我们是为实行自己的主义而牺牲，我们的主义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出。我们是决心用我们的鲜血以使三民主义的救生船航行于中华大陆上。”这段论述充分表达了章琰对三民主义的笃信并为之献身的决心。他主张军人应当用三民主义武装头脑，自觉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关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文稿指出：“有人疑心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不然。”“共产主义是因为产业在资产阶级之手，以至劳动者反不能得适当的生活，所以劳动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施行共产主义，以平均贫富之差别。”民生主义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全在他人暴力侵害、经济压迫之下，勿论贫富，大家的产业都处于日就贫困的境地，所以大家设法来解除压迫，驱逐暴力，以便发展全民族的产业。”文稿接着论证说：“若拿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相比较，那么共产主义的涵义是比较狭的；民生主义的涵义是比较广的。共产主义是专为劳动阶级谋利益，有救贫抑富的性质；民生主义是为全民族谋共同利益，使现在的穷人变成富人，并预防现在的富人将来变为穷人，并不偏重于任何阶